

“松陵四子”并称的意义及文学影响

于金苗¹

(黑龙江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文人并称现象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在并称视域下,文人间的共性容易被过度放大,而忽略个人特质,且对并称的确立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学史现象关注不足。以吴中文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并称的“松陵四子”为例,这一并称关系的达成过程尚未有人详述原委,存在诸多含混不清之处。故以“松陵四子”为切入点来考察文人并称现象出现、演变过程,可对文学史中某一群体、流派、风格、文学批评等作另一维度的解读,并能打破群体意识怪圈,还原彼时文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本来面目以及并称群体之于文学、时代、文化的多维面貌。

【关键词】:松陵四子 文人并称 怀才不遇 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22)01-0148-1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人并称现象屡见不鲜,至有清一代而蔚为大观,甚而达到稍有名气的文人都有某个并称称谓,有的还不止一个。在并称视域下,文人彼此间存在的相似或相通特质被过度放大,个人往往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被放置于并称关系整体来审视,这就很容易造成过于重视共性而忽略个性。如胡媚媚注意到清代诗人并称群体趋同化倾向,指出“这种群体性趋同化创作帮助清人实现社交需求和情感互动,并为构建异于其他朝代的诗学审美提供文本支撑”。¹事实上,并称文人彼此的风格、成就、地位、价值都不尽相同,不应等量齐观。可以说,对文人并称现象出现确立过程的考察,就是对文学史中某一群体、流派、风格、文学批评等另一维度的解读:“有时候,它是某一时期文坛横断面的扫描;有时候,它是某种风格集中的呈现;有时候,它是某种文学流派的表现形态。”²由吴中文人计东³、顾有孝⁴、潘耒⁵、吴兆骞⁶组成的“松陵四子”也是这样一个并称群体。本文拟结合史料,考辨“松陵四子”这一并称关系究竟是何人何时提出,如何演变,四子文学成就如何,彼此有何往来,得以并称缘由为何,在文学史上有何影响等,以便明晰相关问题的含混不清之处,并力图打破群体意识怪圈,还原彼时文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本来面目以及并称群体之于文学、时代、文化的多维面貌。

一、“松陵四子”并称的提出与演变

“松陵四子”这一称谓,最初是在个体场域进行阐释而出现的,总体有一个由个体场域阐释到公共场域阐释的过程,这也是很多并称关系形成的大致路径。按陈去病的说法,“松陵四子”是承接“四遗老”而来,四人最初是以“四才子”之名出现在文坛的:“先是国变后,邑中有王、戴、潘、吴四遗老之目。及潘、吴遭故,而后起者,又有计、顾、潘、吴四才子之目,即改亭、茂伦、稳堂、汉槎是也。”⁷陈氏所言,当有所本,惜未得见。然可以肯定的是,此中所谓四遗老,潘、吴即指潘耒、吴炎,而王当指王锡阐,戴即戴笠。就目今所见资料看,“四才子”这一提法具体是何人提出尚不得而知,但在“松陵四子”这一并称出现之前,四人已作为一个整体以“四才子”之名并行于世,但并未获得大范围流传,且据陈去病之言推测,四人并称至少是在康熙二年(1663)潘耒、吴炎等人身陷庄氏《明史》案被问斩之后。当然,还要注意的,在此之前,除了出生稍晚的潘耒,其他三人在顺治朝已各立名目,在文坛颇有声誉。而实际上,早于四人之前已存在与之称谓极为相近的另一群体“吴江四子”。

¹作者简介:于金苗,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讲师,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项目编号:14ZDB076);2021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计东与清初文坛生态研究”(项目编号:21ZWC258)的阶段性成果

按,“吴江四子”张隽、吴炎、潘耒、董二酉亦有“松陵四子”之目。松陵为吴江之别称,“吴江四子”与“松陵四子”当为同义。“吴江四子”一说最早见于同时同邑文人吴丹生《贯斋遗集》,而集中内容具体为何今未得见,《(乾隆)震泽县志》《(同治)苏州府志》、黄兆柟的《(光绪)平望续志》等皆引其说:“吴江四子,张隽年最长,董二酉次之,吴炎又次之,潘耒最少。皆博闻有才,弃诸生,以著述自娱。……《贯斋遗集》。”⁸

“吴江四子”隐然难见,或者“庄史之祸”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吴炎、潘耒、张隽皆因之而殒身丧命,案发时董二酉业已去世,亦被剖棺戮尸。新的“松陵四子”继之而起,以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为中心的并称逐渐上升为日常称谓。不过,对“松陵四子”的确认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实际是乾嘉时期的文人张廷济、翁广平等人。

起初,嘉兴文人张廷济对四子中的吴兆骞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敬仰,生平喜读其诗,搜罗几尽,并将“吴孝廉汉槎唱和之作与友朋之尺牋”⁹梓为《秋笈附编》,请好友翁广平为之作序。翁广平在《秋笈附序》中明确指出:“夫汉槎,‘松陵四君子’之一也。三子者,计甫草、顾茂伦、潘稼堂也。”⁹此处可以看出,此际的四人因均身出松陵,已有“松陵四君子”之目,但仍不是“松陵四子”。而翁广平平时亦有藏书的习惯,对计东次子计默的作品有意收罗。当计东族裔计光圻欲搜罗先人计东、计默的诗文集付之剞劂时,翁广平遂尽出所藏计默诗文集赠之,并为刻成之《计葦村遗稿》作序。翁广平之序也透露出“四子”在清初便文学成就斐然,诗、古文、时文皆已获乡里称许、雄视一世的事实:“我邑于国初时,有称计、顾、潘、吴四子者,谓甫草、雪滩、稼堂、汉槎也,四子俱以诗、古文辞雄视一世,其后裔皆能以读书世其家。然都为应世时文,亦颇有声。”¹⁰从翁广平《听莺居文钞》看,集中对家乡松陵人文、历史、风物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家乡前贤也有不少推扬称颂之语。嘉庆十九年(1814)冬,姚鼐在为《听莺居文钞》作序时,便注意到这一特点,称赞翁广平俨然为家乡先贤之继起者:“今翁子继稼堂诸君而起,著作之富未肯稍让,而其处境有极人世所难堪者。”¹¹在序中,姚鼐虽未对四子有整体性夸赞,然在细数吴江一地钟毓人物时则提及其中三子潘耒、吴兆骞、计东,并对三人坎壈不遇的人生经历抱以无限同情:“古人云:‘非穷愁不能著书。’又曰:‘文章憎命达。’即以吴江一邑论之,如潘稼堂、徐虹亭以博学鸿儒科入词垣,不久落职。吴汉槎以科场事遭戍,计甫草以奏销案被斥。”¹¹赞诸人“遗集至今流布人间。盖天欲困厄其一身,正所以畀之千古也”¹¹。嘉庆二十一年(1816),另一个为翁广平文集作序者汪家禧则明确提及“松陵四子”,并对四子之文赞誉有加:“松陵顾、计、潘、吴四子,以文藻烁一时。”¹²同时还称赞翁广平“既具计、顾、潘、吴之文藻,兼朱、陈、王、沈之朴学”¹²。从陈去病、张廷济、翁广平、姚鼐、汪家禧等人言论看,“松陵四子”的声名在当时乃至后世已流传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只是称谓不一,尚未统一固定下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计、顾、潘、吴已经以一个固定的群体面目并行于世了。

“松陵四子”之称的正式定名,达成由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的转变,则得益于嘉庆时期文人翁广平之子翁雒。翁雒有意将四人进行合并推广,特以“人物群像”画辅以记、跋综合运用作为四子并称的有效传播方式,标榜家乡名人,为所崇拜前贤积极渲染造势。受父亲影响,翁雒追慕四子,遂“购求四像,而手摹之,阅五寒暑而后成”¹³,名曰《松陵四君画像》,以示乡里,期望四子“俾夫百余年来,老成典型均得以勿坠于地”¹⁴,遂延请顾广圻作《松陵四君画像记》、张云璈作《松陵四子遗像跋》。以人物画像群图形式作为固定、传播并称组合的做法古已有之,如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宋李公麟《饮中八仙图》、宋刘松年《十八学士图》等,逮于清初禹之鼎《五客话旧图》等,都是以画像形式成为并称佳话的代表。翁雒有意采取这种形式将“松陵四子”这一组合推而广之,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他还不满足于此,又效仿前人以人物合咏形式而作的咏史诗,将合咏诗歌作为并称佳话的有效传播手段,作《松陵四子咏》《题松陵四子象画册》;还请友人张廷济作《翁小海雒松陵四先生画像》诗,为每人各作一首,加以歌咏。他们以醒目明确的诗题对四子并称名号反复加以强调颂扬,无疑对并称称谓的确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翁雒等人的一系列举动,“松陵四子”这一并称关系逐步达成向公共场域扩散的效果。张云璈在跋中明确指出,“松陵四子”这一称谓得名于翁雒,至此,“松陵四子”之名得以定型:“吴江翁君小海,摹其乡先辈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四先生遗像邮示,谓之‘松陵四子’。”¹³他还提到,在四人之前已有“松陵四子”,也即前文所提“吴江四子”,然因松陵乃吴江之别称,故二者常被人混用:“前乎此‘松陵四子’,为董二酉、吴炎、潘耒、张隽,皆罹庄史之祸,著作多不传,由其无识而入患难,未可与后四子比矣。”¹³且认为前四子因“无识而入患难”,声名不可与后四子同日而语,故后世所称“松陵四子”多专指计、顾、潘、吴四人。

值得注意的是，“松陵四子”这一称谓还涉及了文人并称的构成规则。从语言学角度看，“松陵四子”是“地域+数目词+端语”的结构，松陵是地域，四是数目词，子可理解为才子或君子，表达了对四人的美好寄寓。并称关系下，成员的排序问题也是文人并称现象中常引人关注的对象，或以齿次，或以地位，或以成就，或出于声韵，常会以此引人褒贬次第。从翁广平等人提及后四子时的顺序看，“松陵四子”的排序基本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仅汪家禧曾以顾、计、潘、吴列之，然在同一篇序文中复称以计、顾、潘、吴。按四人生年来看，顾有孝最年长，计东次之，吴兆骞再次之，潘耒最幼，可知诸人对四子非按年龄排次。从音韵学角度看，计、顾、潘、吴更合平仄，但潘、吴、计、顾也不拗口。从才学、声名来看，四人各有所擅，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声名似乎潘耒和吴兆骞略胜一筹。缘何如此排序，尚需待新材料的发现。从传播路径看，“松陵四子”并称名号先是在本土松陵一带得到承认，继而扩大到苏州府，又突破本省范围远播他省，如另一文化重地浙江省，所涉地区不限于钱塘、杭州、嘉兴、嘉善等地，再至安徽桐城等地，实现了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文人并称文化传播现象。

二、“松陵四子”的交游与文学活动

吴中历来是文人渊薮，“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¹⁵。这些意气风发的文人，同出一乡，趣味相投，彼此砥砺，俱以文章学问名重一时，形成了熠熠生辉的吴中文坛。四子能从清初一众俊彦中脱颖而出，以“松陵四子”这一整体面目并行于世，足见其才学优长。那么，四子在世时关系如何，是否有所往来，从事哪些文学活动，对文坛又有何影响呢？

细考前后四子的身份可以发现，彼此关系尤为错综复杂。董二酉、吴炎、潘耒、张隽四人为知交好友，吴、潘、张均不幸因庄氏《明史》案而死，案发时董二酉虽已去世亦被剖棺戮尸。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皆一生穷愁不遇。由此八人平生遭际也可窥知彼时文人生存境遇之艰。这前后“松陵四子”之间多是姻友亲缘，关系盘根错节。吴炎乃计东岳父吴从子，是惊隐诗社的骨干成员；而计东则是其同出惊隐诗社的好友朱鹤龄的内侄。潘耒、顾有孝亦是惊隐诗社成员。张隽和董二酉为表兄弟，亦是姻亲。潘耒与潘耒为同父异母兄弟，又与朱鹤龄相友善，与吴炎交最善，而吴炎为潘耒之师。潘耒的妻子为沈自炳之女，而计东和吴兆骞曾在沈自炳家之东楼读书，顾有孝与沈自炳为表兄弟。计东与吴兆骞为总角之交，其父计名乃是吴兆骞的授业恩师，潘耒与吴兆骞是中表昆弟。计东父计名与潘耒之父潘凯同为复社创始人。可以说，除去后世文人出于同情与推崇将之并称之外，在前后四子生活的清初，江南文坛的声气名利通常为一些世家大族或文化世家所掌握、主导，“吴江四子”抑或“松陵四子”名号的达成实有相互捆绑的小群体色彩，彼此奖掖推崇已是相互之间不需言明的常态。

四子本是诗礼传家的世家子弟，少年成名，本可拥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但不幸遭遇亡国之殇。由明入清后，这些意气风发又才华横溢的文人历经动荡和劫难，在时代和命运的打击和压迫下渐渐凋零殆尽。入清后，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并未消歇，而吴中文士亦未屈服于清廷的统治，聚众结社活动尤为活跃。其中有顺治七年(1650)成立于吴江的遗民诗社——惊隐诗社，自成立起便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密切监视。吴炎、潘耒、顾有孝、计东等都是诗社成员，当时在文学和思想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子中顾有孝家之北郭草堂、潘耒的悲溪草堂都是成员集会的地点。吴炎、潘耒、顾有孝、计东等人 与成员魏耕往来密切，而魏耕又是山阴秘密反清团体一员，这些人彼此之间结社往来除文学活动外，也明显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康熙二年(1663)，前四子罹难后，受到文字狱打击的惊隐诗社亦因遭此故而解体。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言，吴中地区的士气文风亦随之产生重大转变：“吴、潘之遭极刑，‘逃社’亦随之涣散，吴中劲节之气严遭摧挫，遗民诗风转入低沉，悲慨心音渐为淡化。极盛百年的吴门人文在康熙年间出现断谷现象，或者说进入了另一种组合结构，吴、潘之死及‘惊隐’解体，实为转折点。”¹⁶也就是在此节点，后四子继起而立，并逐渐在声名上超过前四子。

与前四子相比，后四子虽不至身遭屠戮，然命运亦坎壈多艰。需要说明的是，因潘耒顺治三年(1646)才出生，故与其他三子的交往资料不多，尤其于三子早期的活动参与很少。入清后，计东接连遭遇失去亲人的打击。顺治二年(1645)，祖母去世；顺治三年(1646)，丧父。居忧期间，计东与好友吴兆骞一同读书于顾有孝岳父沈自炳家，彼此切磋诗文，以排解丧亲之痛。三人还一同四处参加社集。当时，江南初定，清廷在顺治二年(1645)便在江南举办了乡试，明末沉寂的社事再次活跃起来。计东基于父亲计名、岳父吴在复社所积累的人脉和名望，在清初的社集中尤为活跃。顺治六年(1649)，他与顾有孝、吴兆骞、朱彝尊等人携立慎交社，当时的许多名士也纷纷加入。三子与当时的文人角逐艺苑，由此声名鹊起，尤其时年方十六七岁的吴兆骞，惊才绝艳，

援笔立就，使见者咋舌，无不望风而低首，以才子目之。

四子在文学上各有所长，治学兴趣不一，然并不影响他们彼此砥砺切磋，相携相助，互相成就声名。顾有孝善诗，矜慎不苟作，被目为“词坛耆硕”。创作之余，他将一生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选诗，以此为业，选本涉及唐律、明诗、清初诗、本邑诗等，约20种之多，在清初一大批选家中声名最著、影响最大：“盖时运承平，骚坛兢起，几于家学梅坡、人师雪滩。”¹⁷ 顺治十四年（1657），顾有孝编选《唐诗英华》，计东一同参辑，其中参与程度尚不得而知，然可以肯定二人都是抱着主张自抒性情、反对复古模拟的诗学理念来进行编选工作的，这从二人的诗歌作品中便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避之讳皆是明朝皇帝，清代则无一避字。可见入清已逾十余载，他们仍未对新朝予以认同，而此举能避过清廷的审查实为万幸。《唐诗英华》一出，影响甚巨，扭转了明七子、竟陵末流之弊，使吴中地区诗学风气为之一变，也使顾有孝名满天下。前四子中的潘樵章亦对此书大为推扬：“明末，吴中诗习多渐染钟、谭。有孝与徐白、潘陆、俞南史、周安、顾樵辈，扬摧风雅，一以唐音为宗。有孝选《唐诗英华》，盛行于时，后来诗体为之一变。”¹⁸ 康熙九年（1670），计东在顾有孝编选完《今诗三体骊珠集》《百名家英华》后，受其嘱托“至京师缮录司马诗”，并为之作序：“我友顾茂伦选《今诗三体骊珠集》《百名家英华》既竣，而自憎其择之未精也，乃搜辑当世大人专集为百名家诗钞之选，今春方刻成宗伯先生诗，而属东至京师缮录司马诗，致之吴门，适幸竟读为序，以上之且以致我友也。”¹⁹ 康熙十一年（1672），计东还为顾有孝所选《驯鹤轩诗选》作序，大力维扬。在为彼此声名奖掖提升上，可以说都是不遗余力的，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也对清初诗风、诗学趣尚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除了在选诗、创作方面互助推扬外，二人还对词集评点有所涉猎，于该年一同与当时的词坛耆宿彭孙遹、王士禄、吴兆宽、王士禛、邹祇谟、赵沅等共同参与龚鼎孳《香严斋词话》评点，互通声气。

除计东外，顾有孝也与吴兆骞有编辑诗选的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彼此推许称扬。顾、吴二人相识的最早资料见于吴兆骞十三岁时所作《子夜歌》二首，即为和顾有孝而作。二人曾一同出游，吴兆骞有诗《冠霞阁同顾茂伦、赵若千晚眺》，尽发乡关之思。当顾有孝隐居垂虹桥时，吴兆骞亦有《题茂伦隐居》诗以赠。除了日常诗文往来外，二人还在选诗上有过商榷与合作。顺治十八年（1661），顾有孝与董二酉合编地方性清诗选本《吴江诗略》，意在推扬时贤，内收吴兆骞诗18首，在选辑具体诗篇时应与流戍北方的吴兆骞有过书信往来商榷：“《今诗萃》及《吴江诗略》所选我诗，妹可着沈华将细字写了，照样圈点，寄我一看。”²⁰ 顾有孝也因此险些被牵连至庄氏《明史》案中。在遇赦南归后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吴兆骞与顾有孝还与蒋以敏共同编选了《名家绝句钞》：“吴郡顾荣茂伦，挥扇多暇。适逢吴札乍返延州汉槎，遂相与研露晨书，糠糲暝写，撷两朝之芳润，掇数氏之菁华，凡若干篇，都为一集。”²¹ 次年，吴兆骞携之入京四处传扬，影响甚大。吴兆骞还延请好友徐乾学、纳兰性德为此书作序。约在此际，顾有孝辑《闲情集》，吴兆骞亦曾助其参订。

正是在一次次的诗文集编选、社集的交流、切磋与推扬中，三子逐渐声名鹊起。而潘耒以出生稍晚虽较少参与三子的活动，然继承恩师顾炎武衣钵²²，在清初实学、史学领域声名显赫，影响巨大，这也是他能成为“松陵四子”一员的关键。四子不仅时常一同参加各类文学活动、集会，还在生活中彼此帮扶互助。计东诗文集集中常出现“予因茂伦得交南昌喻子”²³ “我友顾茂伦，每言程少府”²⁴ 一类的字句，可知顾有孝在计东四处游走晋谒时会为之推扬举荐。顺治十一年（1654），丁酉科场案发，吴兆骞不幸身陷其中。计东、顾有孝多方奔走斡旋未果，吴兆骞最终被褫革举人身份并流戍宁古塔达23年之久。吴家被罚没财产，计东不惜析产以助吴家，并与顾有孝、宋德宜等多方奔走，倾力斡旋营救，以至吴兆骞在《家书第二》中感慨有“感恩入骨”之感：“儿凡事承右与甫，骨肉至爱，重为周全，儿真感恩入骨。”²⁵ 在狱中，吴兆骞有《秋夜寄计甫草》抒发心怀。流戍期间，吴兆骞也与计、顾往来诗文书信不断。顺治十五年（1658），顾有孝作《与吴汉槎书》予以宽慰：“荀卿氏有言：‘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愿仁兄详味其言，则目下漂流绝塞，家室流离，亦作会稽、曹卫观可耳。由此而竖起脊梁，潜心理道，以上承天意，则今日之忌兄祸兄者，非兄之益友耶？曷恨哉？汉槎勉之！远大在前，努力自爱。”²⁶ 顺治十六年（1659），吴兆骞作《闰三月朔日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请父亲分别抄送于14位平生知交好友，计东、顾有孝均在其中。顺治十八年（1661），吴兆骞接连修书两封1500余字《与计甫草书》，感念其奔走相助的恩情：“昨年遭难，吾兄屡顾我若卢之中，衔涕摧心，慰藉倍至。等公孙之奔走，似田叔之周旋，愧荷深情，犹在心骨。”²⁷ 纵使吴兆骞被流放二十余年，众友人依然没有放弃营救之念。康熙十九年（1680），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潘耒寄《与表兄汉槎书》并赋诗一首给素未谋面的表兄吴兆骞，叙及两家渊谊，表示自己通过表兄吴兆宽（计东姻亲）已“具知表兄旅况”，并欣喜地透露自己正与众友人设法营救的具体细节，“兹新例宏开，西还可待。阊咨到后，弟与电兄，雀跃

起舞。……已将吴、钱二姓家属，别具一呈，令小僮同徐仆充递，尚移刑部查案，往复之间，正费时月。然大体得当，皂帽西来，正复不远。尔时握手叙心，真所谓相对如梦寐矣”²⁸。潘耒在所赋诗中对吴兆骞的才学深表服膺，对其遭戍遭遇寄予无限同情，并不断给予他赦还的希望。在计东下世六年后的康熙二十年(1681)冬，在顾有孝、潘耒与纳兰性德、顾贞观、徐乾学、宋德宜等人多方斡旋下，吴兆骞终于遇赦归乡。归来后，互相敬仰的二人终得相晤于京师，以诗赋著称的吴兆骞多次赞扬潘耒之赋“不落齐梁风格”²⁹，赞“次老之才，李供奉流也”³⁰，推崇备至。

通过四子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他们同出一乡，有鲜明的地域意识，彼此亲缘关系也错综复杂，无论是在家乡吴中还是京师、江浙等文学场域中，他们都十分注重彼此声名的奖掖，在彼此危难时倾力相助，还有意以编纂诗选、诗略等形式推扬家乡名士，并通过编选《唐诗英华》《今诗三体骊珠集》《百名家英华》等来扭转当时的诗坛风气。可以说，透过四子这一并称群体，折射出了清初江南文人群体创作、交游乃至文学批评的某些片段，并关联着彼时的文学流派、文学趣尚、文人结社以及政治文化环境，对清初文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切入点和审视维度。

三、“松陵四子”并称缘由及其文学影响

吴中乃江南文化重地，人才辈出，我们不禁疑问，为何是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四人并称“松陵四子”，所据为何？可以说，“松陵四子”的并称既与四子所处时代与身份息息相关，还包含了命名与阐释者的自我生命体验与情感寄托，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地域性与时代性，透射出彼时文坛血缘、学缘与地缘等多重关系交叠下的结群意识与标榜风气。通过深入梳理考察发现，命名与阐释者以“松陵四子”这一符号化的方式构成群体并称关系，大体是从四子之才学、性情和坎壈不遇的遭际等方面来考量的。

就才学来说，四子赢得了当时乃至后世很多文人的认同。计东擅作古文，顾有孝专于编选，潘耒长于实学、史学，吴兆骞工于诗歌、骈赋已是时人的共识。乾隆时期吴江文人袁景辂直言：“吾邑人文，国初最盛。经术推朱鹤龄，古文推计改亭，诗赋则擅场虽多，当以吴孝廉为最。”³¹只是并未将四子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到了乾嘉时期，四子便开始以整体面目出现，并在才学上得到文人广泛的认同。汪家禧认为四子在文上的成就是他们获得认可的关键：“松陵计、顾、潘、吴四子，以文藻烁一时。”³²姚鼐认为，四子因坎坷经历而使文学词章大有所成，是“非穷愁不能著书”“文章憎命达”³³的典型代表。翁广平则称“四子俱以诗、古文辞雄视一世”³⁴，全面肯定了四子的才学。晚清的陈康祺则专指诗歌是四子皆擅长之学：“皆以诗笔雄视当世，皆落拓无所遇。”³⁵叶德辉《天放楼诗钞序》亦谓吴江为诗人渊薮，认可潘耒、吴兆骞、计东的文学地位：“有清开国，则有徐电发、潘次耕两太史，以鸿词掇大科，联翩台阁；吴汉槎、计甫草两孝廉，领袖江湖。”³⁶从众人的评价可以发现，四子在诗词文赋方面的才学都得到了认可，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文学领域。

翁雒《松陵四子咏》³⁷对四子评价极高，在诗中高度概括了四子的生平遭际与才学：

计甫草

也曾簪笔侍枫宸，依旧归来四壁贫。五论安危传弱冠，一流租税谢头巾。不教雄略酬王猛，总为怜才哭谢榛。宜兴三家谓魏叔子、侯朝宗、汪荅文争鼎力，强弓独自挽千钧。

顾茂伦

残年身世苦沧桑，天遣骚坛属老苍。文选楼高湖海重，玉山堂闭水云凉。一餐藜菜名流附，十载生刍吊客忙。先生没后十年始无吊客。今日滩头谁钓雪，三衣归去上慈航。

潘次耕

青鞋布袜走瑶京，倾国公侯侧目惊。完璧死生师友义，破巢患难弟兄情。白鸥入梦多归思，金马虚期累重名。五岳倦游双户键，龙章还眷老书生康熙圣驾南巡，赐五言律诗。

吴汉槎

万死投荒历百艰，笳声吹老鬓毛斑。不缘鸡树承丹诏，谁赋蛾眉入玉关？词赋惊看驰屈子，姓名恨未落孙山。挥金屈膝皆非易，谓宋相国、徐司寇、顾孝廉诸公卿，洒泪平生旧往还。

从翁诗的排序看，依然是计、顾、潘、吴。在诗中，翁雒谓计东尝著《筹南五论》挽明危局，也曾高中举人却转因奏销案被褫革；赞其才略不输王猛、谢榛之流，尤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计东“强弓独自挽千钧”，与散文三大家魏禧、侯方域、汪琬争足鼎立。谓顾有孝“天遣骚坛属老苍”“文选楼高湖海重”，诗名高卓，又因编选《唐诗英华》等，一改前后七子积习之弊，使当时诗风为之一变，影响之巨以至逝去十载仍然吊客不绝。潘耒《唐诗选评》、翁雒《集唐诗》等皆是受此影响的产物。谓潘耒继承恩师顾炎武之“顾学”，促进清初实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兄长潘耒章因庄氏《明史》案被杀后，一力护送其妻沈氏北上流戍地，在沈氏自尽后又扶柩南还；曾以布衣之身得博学鸿词科第二，入翰林院参修《明史》，引得公卿侧目；不容于时辞官归隐后，仍得皇帝眷顾，以《老马行》诗婉拒。谓吴兆骞才绝艳，“词赋惊看驰屈子”，却不幸身陷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幸得宋德宜、徐乾学、顾有孝等人奔走斡旋，才得返归南国。可见四子在当时亦在各自所擅领域成就突出，名扬于世。对于四子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就，后世文人是深为服膺的。

吴中素为文薮，四人能从中一众俊彦名流中脱颖而出以“松陵四子”并称，高卓的才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更为独特的一点是，与他们自身张扬简傲的个性大有关系。吴人对四子乃至董二酉、张隽、潘耒章、吴炎、吴震的个性早有认知：“八人者，皆气凌一世，往往以小事与人忿事，或竟奋毆，人尽畏之。”³⁸与前四子相比，后四子个性更为张扬，这也是四人被并称的因素之一。跳荡不羁如计东，时人目之为狂人：“自海陵归，渡江，大风雨雪，舟不得发。同行者垂首叹惋，计坐舵楼下，手王阮亭诗读之。至论郑少谷绝句，哭失声。既乃大喜，雪中起坐，观江涛澎湃，吟啸自乐。”³⁹直言无隐如顾有孝：“见有举止错忤、勿克当意者，出其微词冷语，中人要害，勿顾人头面发赤，而胸中实温良易直，不为崖岸斩绝也。”⁴⁰一旦有见解不合，动辄攘臂忿争者如潘耒：“明有史仲彬者，相传为官于朝，曾从建文出亡。有《致身录》一书，是仲彬所著，历叙出亡之事，并从亡诸臣。而虞山钱氏有十无之辨，稼堂宗其说，以攻史氏。史氏后人亦颇盛，遂成仇隙。后史氏请于当道及搢绅先生，以仲彬入乡贤祠。徐电发检讨劾与焉，稼堂复作书与徐辩论。后史与稼堂会于其姻娅沈宅，席间，言及仲彬事，竟至攘臂，一邑传以为笑。”³⁸恃才狂傲如吴兆骞，大言“安有名士而不简贵者”⁴¹，曾戏谓汪琬：“江东无我，卿当独步。”⁴²从这些评价之语可以看出，四子性格之张扬简傲。

四子独特的个性也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诸多祸端与坎坷，怀才而不遇，坎壈而多艰。当然，四子命途坎坷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无关系。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吴兆骞因此被流戍宁古塔 23 年之久；顺治十八年的奏销案，计东被褫革举人功名；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潘耒因兄长潘耒章而被牵连在内，被迫改名奔命；顾有孝则拒不入仕，以布衣终老。回到四子个性本身，也可发现性格与命运关系之一二。计东自谓“我多言躁动疏虞，开罪于人”⁴³，以至他后半生四处游食投谒屡遭挫折。潘耒性情刚直，自谓“愚戆性成，不谙世故，酒酣耳热，转喉触讳，往往获罪于先生长者”⁴⁴，以布衣之身入史馆后，“尤精敏敢言，无少逊避”⁴⁵，最终被掌院学士牛钮以“浮躁轻率，有玷讲官”⁴⁶之名弹劾而遭降调。吴兆骞“少时简傲，不拘礼法”⁴⁷，学成后更是傲放自矜，“不谐于俗，以故乡里嫉之者众”⁴⁸，身陷丁酉科场案以致遣戍当与此不无关联。和三人相比，顾有孝一生相对平顺，然亦是终生不遇。他少而任侠，有志于世，然在历经弘光政权覆灭和恩师陈子龙死国难后，愤而焚毁儒生衣冠，弃诸生籍，隐居于吴江垂虹亭畔，终生不出，即便是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得公卿力荐，仍以病坚辞不就。因而，四子怀才却不遇于时，才高而命蹇，这不能不引发时人乃至后世的理解与同情，以“松陵四子”合称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顾广圻认为，四子“所遇不同，而其遇之归于穷则同”⁴⁹。张云璈亦有此论：“四子者，其出处不一，其怀才不得志于时，则大略相似。”⁵⁰而这也是翁雒绘四子图像而广之的初衷：“此翁君所以不平，而图其像也。”⁵¹

四子各有所擅,深得后世文人的肯定和推许,而他们才高命蹇的遭际也引发了广泛的同情。翁雒受父翁广平影响,钟爱四子,描摹四子画像并四处征集诗文,初衷亦是出于对四子各自遭际之“所以不平,而图其像”：“天之于此数人，分其灵淑之气，以生之异其沆瀣之菁以成之，乃与其才与其识，而独不与其遇。改享有经世之略，论事能动史阁部；雪滩亦游陈黄门之门；稼堂从数千里持嫂氏遗骸，间关以归。是皆抱经济、负血性，能为人所不能为，未可仅以词章目之。即汉槎之赋，能邀睿赏而不蒙鸡竿之赦，岂天生之而忘之而又忌之耶？不惟忌之，且摧折之、困苦之，以濒于死，不知天之有意欤？为无意欤？”⁵¹ 顾广圻则认为，四子所遇不同却同归于穷，值得闻者凭吊自伤：“或牵连遭黜，或终身行遁，或裁登旋替，或窜逐濒殆，所遇不同，而其遇之归于穷则同。”皆因其学而光炎难泯：“士生于世，其能卓然自立，没而为人称道者，亦曰学而已矣。是故其不学也，岂无禄位？赫奕容貌壮佼，沾沾自喜，而转眄道尽，徒类孤雏腐鼠。其学也，则虽槁项黄馘、偃蹇困顿、溘死无时，而光炎难泯。闻其风者，往往流连遗迹，至于弗能自己。”⁵² 而四子画像、声名得以传流后世，“不啻与古来盛德丰功丹青炳焕者等，岂非四君之各显其学，有以自致于此乎”⁵²。在张云璈看来，“四子者，其出处不一，其怀才不得志于时，则大略相似。其人或甘沉沦，或遭罪谴。虽潘稼堂太史八金门上玉堂，受圣主特达之知，以为可吐才人之气矣。而少撙家难，流离颠沛，仕亦旋斥。所谓诗人例穷，不知谁创之，而谁主之也。夫天下岂独四子然哉？松陵亦岂仅此四子哉？”⁵¹ 至此，将四子并称的意义进一步升华，以四人之不遇指代天下文人之不遇，使之具备了更为普泛而独特的价值。

这种旨归在同样身为吴江文人的翁广平身上即得到了印证。翁广平亦是安贫力学之士，为文“议论闲肆，反覆驰骋，而不乖于法”⁵³，被姚鼐目之为四子的知音与继起者：“翁子虽贫穷，其文学辞章未尝不遇知音也。”“今翁子继稼堂诸君而起，著作之富未肯稍让，而其处境有极人世所难堪者。”⁵³ 汪家禧则赞他“既具计、顾、潘、吴之文藻，兼朱、陈、王、沈之朴学”⁵⁴。这种自我代入抑或被他人目之为如四子般怀才不遇，可以说是四子影响在后世的映照和投射。翁广平特为每人作传一篇，而对四子的穷愁不遇，则更为同情吴兆骞的遭际，认为“三子虽穷达不同，然皆得优游林下以自适”，而“独汉槎遣戍万里之外，雪窖冰天，历二十五年之久，故其佗僚厄塞，悲愤无聊之况，一一发之于诗”。⁵⁵ 对于四子的怀才不遇，翁广平更是将之与屈原、李白、韩愈、苏轼辈相提并论：“古今来，恃才能而不遇者，若三闾大夫、李太白、韩昌黎、苏子瞻辈，其文章诗赋断为千秋绝调。”且认为四人正是因遭贬斥才使诗文穷而后工，成就不朽的声名：“然使此四人者不遭贬斥，其文章诗赋必不能若是之工，若是之悲壮，若是之流布，而动人哭泣歌舞也。”⁵⁵

张云璈在感慨四子之不遇的同时，也认为四子声名已得远播后世，口耳相传，天下仍有无数仁人志士怀抱四子之才，同遭四子之不遇，却终生籍籍无名，声名并未如四子一样在后世流传：“虽然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而四子至今在人耳目，似亦可以无憾矣。嗟乎，世固有如四子之才，有四子之嗇，而并不得如四子之名者，是又望四子而如在天上也，尤可慨已。”⁵¹ 顾广圻不禁呼吁和期盼，天下如翁广平等怀才不遇者都能如四子一样声名不坠：“诸公之光炎难泯，亦正犹夫此四君也。”⁵²

在儒家传统文化做主导的封建社会，济世救民、致君尧舜是文人的普遍志向，然能实现抱负者寥寥，怀才不遇情结便成了文人创作中反复吟咏的主题。自古“文士多奇，诗人尤薄命”⁵⁶，屈原、贾谊、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都作为怀才不遇的典型，被历代文人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一直被吟咏、称颂、怀念着。“松陵四子”亦因才高学深，个性简傲张扬，却终生穷愁不遇，又同出一乡，更容易引发后世文人的广泛同情、喜爱与关注，进而自我代入引发怀才不遇之憾。这也是四人作为怀才不遇的典型被定义、流传下来的关键所在。

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言：“诗歌史上屡见之‘七子’‘五子’‘十子’一类名称，不应轻忽为一般的文人风雅习气，其实这类现象正是朝野诗坛领袖们左右风气走向的表征。”⁵⁷ 而“松陵四子”不唯在诗坛，实则各有所擅，引领一时：“经世文章动帝乡”⁵⁸ “空怀济世安人略，曾有惊天动地文”⁵⁹ 的计东；“物外搜罗归大雅，篋中文字绝无伦”⁵⁹ 的顾茂伦；“漫拢彩笔修秦史，脱却山衣事汉臣”⁵⁹ 的潘耒；“君恩如海许南旋，听了笳音二十年”⁶⁰ 的吴兆骞，“人但悲其数奇运蹇而已”⁶¹，一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抹独特的亮色。“松陵四子”并非有统一学术主张的文学群体或流派，然四人以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各自树立，又因同出一乡、个性张扬、怀才不遇而被目为一个小文学群体。或许，在华夏五千年灿烂的文学文化史上，如“松陵四子”一类的并称群体很多，其声名、影响不能跟“竹林七贤”“建安七子”“三苏”“李杜”“唐宋八大家”等相提并论，却是文学史上少见的以过人的才学、张扬的个性、坎壈的遭际而共闻于世，进而成为怀才不遇的文人代表，并为后世的失意文人提供了更多的情感寄托与

自我期许空间，而这也是“松陵四子”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注释：

1 胡媚媚：《清代耆老会与诗人并称群体的结社传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49页。

2 刘跃进：《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3 计东（1624-1676），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明诸生。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顺治十八年（1661）以奏销案诬误被黜。一生游谒奔走，诗文亦因好游而益工。著有《改亭诗文集》《甫里集》等。

4 顾有孝（1619-1689），字茂伦，号雪滩钓叟。江苏吴江人。明诸生，入清后以遗民终。工于诗，著有《雪滩钓叟集》。另编有《唐诗英华》《江左三大家诗钞》《吴江诗略》等。

5 潘耒（1646-1708），原名潘栋，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专精经史词章。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征试，以布衣授翰林院检讨。著有《遂初堂集》《类音》等。

6(1) 吴兆骞（1631-1684），字汉槎，号季子。江苏吴江人。幼有神童之目，工诗擅赋，惊才绝艳。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身陷科场案，被流戍宁古塔23年。著有《秋笳集》等。

7(2) 陈去病：《陈去病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65页。

8(3) 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卷一四八，清光绪九年刊本。

9(4) (5) 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三《秋笳附编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

10(6) 翁广平：《序》，计默：《菽村文集》卷首，清咸丰九年秀水计氏刻本。

11(1) (2) (3) 姚鼐：《序》，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6册，第131页。

12(4) (5) 汪家禧：《序》，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6册，第132页。

13(6) (8) (9) 张云璈：《简松草堂诗文集》文卷一一《松陵四子遗像跋》，清道光刻三景阁丛书本。

14(7) 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五《松陵四君画像记》，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

15(1) 袁宏道：《瓶花斋集》卷六《叙姜陆二公同适稿》，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95页。

16(2) 严迪昌：《清诗史》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页。

17(1) 薛凤昌：《序》，周之祯、费善庆编：《垂虹诗剩》卷首，民国四年吴江费华萼堂刻本。

18(2)潘耒章:《松陵文献》卷一〇,清康熙三十二年潘耒刻本。

19(3)计东:《改亨文集》卷一《宝翰堂诗集序》,清乾隆十三年计瑛读书乐园刻本。

20(4)吴兆骞:《家书第十五》,吴兆骞、戴梓:《秋笈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页。

21(5)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卷一三《名家绝句钞序》,清康熙三十年徐乾学刻本。

22(6)顾炎武与潘耒兄怪章曾同为惊隐诗社成员,于康熙八年(1669)收潘耒为门生。

23(1)计东:《改亨文集》卷四《南昌喻氏诗序》。

24(2)计东:《改亨诗集》卷一《赠程昆仑郡丞》,清乾隆十三年计瑛读书乐园刻本。

25(3)吴兆骞:《家书第二》,吴兆骞、戴梓:《秋笈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第241页。

26(4)吴兆骞撰,麻守中校点:《秋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378页。

27(5)吴兆骞:《与计甫草书》,吴兆骞、戴梓:《秋笈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第228-229页。

28(6)李兴盛、全保燕主编:《秋笈余韵外十八种》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9(7)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一《伤逝赋》,清康熙刻本。

30(8)吴兆骞、戴梓:《秋笈集·归来草堂尺牍·耕烟草堂诗钞》,第262页。

31(1)袁景辂:《国朝松陵诗征》,清乾隆三十二年吴江袁氏爱吟斋刻本。

32(2)汪家禧:《序》,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6册,第132页。

33(3)姚鼎:《序》,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6册,第131页。

34(4)翁广平:《序》,计默:《菴村文集》卷首。

35(5)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八,清光绪刻本。

36(6)叶德辉:《叶德辉诗文集》一,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387页。

37(7)翁雒:《小蓬海遗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1-32页。

38(1)(4)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
- 39(2)钱林：《文献征存录》卷一，清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 40(3)徐鉉：《南州草堂集》卷二五《雪滩头陀传》，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 41(5)王晔：《今世说》卷三，清康熙二十二年霞举堂刻本。
- 42(6)陈和志等：《(乾隆)震泽县志》卷一九，清光绪重刊本。
- 43(7)计东：《改亨文集》卷六《送表弟董方南南归序》。
- 44(8)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二〇《祭叶文敏公文》，清康熙刻本。
- 45(9)冯桂芬等：《(同治)苏州府志》卷一〇六。
- 46(10)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六，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 47(11)盛泽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盛湖志》上，广陵书社 2011 年版，第 171 页。
- 48(12)徐鉉：《南州草堂集》卷二九《孝廉汉槎吴君墓志铭》。
- 49(13)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五《松陵四君画像记》。
- 50(14)张云璈：《简松草堂诗文集》文集卷一一《松陵四子遗像跋》。
- 51(1)(2)(5)(11)张云璈：《简松草堂诗文集》文集卷一一《松陵四子遗像跋》。
- 52(3)(4)(12)顾广圻：《思适斋集》卷五《松陵四君画像记》。
- 53(6)(7)姚鼐：《序》，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66 册，第 131 页。
- 54(8)汪家禧：《序》，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66 册，第 132 页。
- 55(9)(10)翁广平：《听莺居文钞》卷六《秋筵附编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66 册，第 149 页。
- 56(13)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70 页。
- 57(1)严迪昌：《清诗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56 页。
- 58(2)张廷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卷三《翁小海雒松陵四先生画像》，清道光刻本。
- 59(3)(4)(5)翁雒：《屑屑集》，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42 页。
- 60(6)张廷济：《桂馨堂集》顺安诗草卷三《翁小海雒松陵四先生画像》。

61(7)李孟符：《春冰室野乘》，《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一辑，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2 页。